

## 【文学研究】

## 杨巍与吕时臣的诗歌交游与共鸣

谭金波

(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, 山东 青岛 266071)

**摘要:**明代中后期文坛上,杨巍与吕时臣交游密切,两人自嘉靖四十二年(1563)相识,诗文唱和近半个世纪。杨巍与吕时臣的交游具有一见如故、诗酒相伴、不涉政治等特点,是与名利无关的倾心之交。同时,杨、吕分别以太宰和山人的身份发声共鸣,在复古潮流中卓尔不群,在中兴时代里不慕名利、梦想隐逸,成为官场和文坛中的一股清流。

**关键词:**杨巍;吕时臣;诗歌;交游;共鸣;隐逸

**中图分类号:** I 206.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DOI:** 10.13486/j.cnki.1673-2618.2024.01.008

杨巍(1517—1608),字伯谦,号梦山、盘石,又号二山,晚号漫翁,山东海丰(今山东无棣)人,嘉靖二十六年(1547)进士及第,与王世贞、张居正、李开先等同年,历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,官至吏部尚书,乡人习称为“杨天官”。《明史》云:“巍素厉清操,有时望,行长厚”<sup>[1]卷225,3947</sup>,言其为人醇厚清雅。杨巍著有《梦山存家诗稿》八卷,选辑《弘正诗钞》,并有《桃花岭集》《归桃花岭诗集》收录其两次回归故里时朝中同僚和诗人学者所赠之诗。王士禛评其诗曰:“杨梦山先生五言古诗,清真简远,陶韦嫡派也,五律尤高雅沉澹。”<sup>[2]卷2,64</sup>同时,杨巍在理学、佛学和军事方面也造诣颇高。

吕时臣(1517—?)<sup>①</sup>,一名时,字中父、中甫、仲甫,号四明山人,浙江鄞县(今浙江宁波)人。早岁有诗名,以避仇远游,历齐梁燕赵间。至青州,客衡王府。衡庄王爱其诗,为刻《甬东山人

稿》<sup>②</sup>,与李开先、谢榛、孔天胤酬唱有交,晚岁至沈宣王所,客死河南。吕时臣为人“贞介廉洁,不妄交,不苟取”<sup>[3]卷38,5</sup>,故为人所重,工诗亦工散曲,稿已不存。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评其诗云:“诗品在中麓、梦山之间,同时曳裾王门者,多逊之。”<sup>[4]卷14,417</sup>

杨巍游离于复古派主流之外,也不与复古诸子交游酬唱,在文学界声名不显,幸赖其官高名重,加之后人旁搜博采,故生平履历十分清晰,主要诗文著作尚且存世。吕时臣则不然,他一则终身不仕,二则远游异乡,且不妄交往,幸存作品除《甬东山人稿》外,其他散见于友人诗文中,故考察杨巍与吕时臣之交往主要从杨巍一方着手。

## 一、杨巍与吕时臣交游情况

杨巍《存家诗稿》中收录与吕时臣相关诗歌

① 根据孔天胤《闰腊迎祥序》中吕时臣自述“生于正德丁丑”即正德十二年,又据孔天胤万历五年诗歌《闻吕征君六旬将自潞还越寄言赠之》,万历五年(1577)时六十岁,也印证其生于正德十二年之说。至于卒年,《静志居诗话》卷十四、《鄞县志·人物传》与《山西通志·寓贤》均认为吕时臣年七十卒于河南涉县,以生于正德十二年论,即卒于万历十五年(1587);另有《明太宰杨巍史料集》却记载杨巍在万历十五年后还频繁收到吕时臣的书信,甚至见面,直至万历三十四年(1606)元旦。若生于1517年,即寿至九十左右。

② 因其家居宁波之东,故称甬东,杨巍诗文多称之为“吕二山人甬东”。

收稿日期:2023-07-26
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山左作家与明代文学思潮的嬗变研究”(21BZW198)

作者简介:谭金波(1999—),女,山东淄博人,在读硕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。E-mail:tanjq9911@163.com

二十八首。关于二人的交游,在无棣县政协委员会编选的《明太宰杨巍史料集》中记载较为详尽。杨巍所作《吕二山人〈绣岭新词〉序》称:“四明吕山人以诗词鸣于江湖,避岛夷之变,来游塞上,遂相识于怀来城中。”<sup>[5]225</sup> 据此可知,两人相识于嘉靖四十二年(1563)。是年七月,杨巍秋日怀归,写“秋风昨夜雁初回,忽忆平生绣岭居。怅望云山千里隔,蹉跎关塞七年余”<sup>[5]附录467</sup>,吕时臣从鄆江来到燕塞游玩,与杨巍一见如故。山人闻知杨巍海上有绣岭别业,新开十景,因此赠乐府一套,候他日悬车之暇,令人歌之,以申山人感激之怀。此次初见,杨公作《怀来城逢四明吕二山人二首》《秋日送吕二山人南游兼寄青州陈同年芝巘》。嘉靖四十四年(1565),杨巍奉母在无棣城东北的桃花岭别墅,秋七月四日,与吕时臣对酌,有蛺蝶吸山人杯中酒,山人有醉态,作《醉蝶吟》,杨公和之并作《沽酒与吕山人话旧》。

此后的漫长岁月里,两人多是书信往来:隆庆五年(1571),杨巍五十五岁,在籍养病,春二月,“喜得吕二山人甬东并庐山清溪上人书”<sup>[5]17</sup>;隆庆六年,杨巍作《壬申九日登览旷亭,忆旧会兼喜谷司马初还次前韵》言“暮雁声偏疾,寒花色自斑”<sup>[6]卷3,495</sup>,又作《九日同吕山人登览旷亭》,时间同样在深秋,“千林秋叶坠,万里塞鸿还”<sup>[6]卷3,495</sup>,据此推测,在1572年秋,两人或得一聚;万历三年(1575),杨巍因见张居正“好用竞进喜事之人,不用恬退简静之士”<sup>[5]自叙履历,40</sup>,又以母亲年高,遂告终养回籍,同朝诸公钱送,赠奉亲诗。三月杨公抵家,寄山人书,同年九月得回信;万历六年(1578),桃花岭小园已成,其间“杂植花木盆石沼鲤鱼种种。每遇芳辰,奉母太夫人娱赏,开筵花下,子孙罗拜称觞,不知人间世复有何乐”<sup>[5]杨公行状,73</sup>,此时杨巍已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与吕时臣初遇时畅谈的理想,于九月得山人书;万历十九年(1591),杨巍年已七十五,致仕回乡后,于仲春修补龙溪别业和桃花岭别墅,植荷畜鱼,种竹栽松,外界王锡爵罢官、满洲军威大振,政治事件轰轰烈烈,却都与杨巍无关。是年六月,时隔十几年,喜得吕时臣书;万历二十一年(1593)元宵夜,寄吕山人书;万历二十五年(1597)腊日喜得吕山人书;万历二十六年(1598)元宵节,送吕山人往邯郸谒拜吕仙祠,杨公作《送

吕山人往邯郸谒吕祖祠》;万历三十三年(1605),因杨巍前年在耕田时泥滑跌倒,近年一直修养双足,多作谑语诗,三月喜得吕山人过访,杨公作《喜吕二山人中父见访》;万历三十四(1606)年元旦,杨巍年登耄耋,于人日,也是于此生最后一次收到吕时臣的书信。万历三十六年(1608)十一月三十日亥时,杨巍于故居寿终正寝,这段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也至此终结。

从交游时间不难看出,两人见面叙怀和书信往来多集中于杨巍归里期间,杨巍在朝时候,吕时臣仿佛隐身,两人鲜有交往。即使在杨巍的政治生命陷入险境,朝堂大事人尽皆知诸如“王大臣案”、为过世的张居正陈情、“争国本”事件时,也不见杨公诉苦和山人慰问。二人往来诗歌从未谈论政治,甚至在杨巍的整部诗稿中也罕见,偶然言及官场朝堂,也只用“尘世”“泥途”代称。由此可见,二人之交游与权势无关,是纯粹的知己之交。

## 二、杨巍与吕时臣的诗歌交游情怀

吕时臣更像是杨巍不染凡尘的“世外桃源”,代表了杨巍的逸世理想和田园隐逸情怀。杨巍从不吝于展现两人情谊之深厚,曾多次表达互为知己之义:“我知山人心,长与变化俱”<sup>[6]卷1,481</sup>,“潦倒不堪用,非君孰我知”<sup>[6]卷3,495</sup>。并且,诗与酒是他们志同道合之所在,也是维系知己之交的重要工具。如杨巍写“平生嗜酒苦无钱,愿我买田多种黍。年年五月访我来,红葵白葵满树开。不须更作惊人句,且向花前倾酒杯”<sup>[6]卷4,511</sup>,饮酒赋诗已然成为两人相聚的一个目的。

### (一)知己情怀

两人一见如故,四十年间互相关怀、互相理解。嘉靖四十二年(1563),杨吕于怀来城中初遇,彼时正值多事之秋,越桥鄆江干戈未息,塞上秋来贼寇屡犯,虽然杨巍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,更兼多立战功,但那年距其从京师左迁山西任职已有七载,背井离乡也有九个春秋,遭受边关的艰苦和羁旅的惆怅。但他一逢吕时臣却如沐春风,正所谓“我正悲羁旅,逢君一解颜。”<sup>[6]卷2,490</sup>

杨吕互为知己,志同道合,两人的投缘常常表现为对彼此的了解和欣赏。吕山人存世资料

极少,后人却可以从杨巍笔下认识吕时臣,这本身就是两人情谊的有力证据。杨巍为吕时臣改号,而吕时臣一直沿用,并用此号活在后世人的称呼和记忆里。吕时臣原有号为东野,杨巍认为这个号犯古,山人又气韵潇洒不似孟郊,忆起古诗云:“四明有狂客,风流贺季真”<sup>[7]卷23,1085</sup>,且四明乃属甬东郡,所以为其另拟新号为“甬东”,并作《甬东篇》为吕时臣其人其号作注。此事见于杨巍《存家诗稿》卷一,通过描述,一个好游历、有诗名、类逸仙的布衣诗人形象跃然纸上,可以作为后人了解吕时臣的入口:

四明美山水,我闻已多年。  
八十二峰云,日夕带甬川。  
中有季真宅,松竹凌苍烟。  
高风与胜迹,万古光林泉。  
明时有吕子,逸气何飘然。  
虽在甬东住,未买甬东田。  
搗来游海内,声诗盛流传。  
山中与野服,见者称贺仙。  
将欲寻瑶草,孤踪寄八埏。  
时人或未识,观我甬东篇。<sup>[6]卷1,484</sup>

吕时臣的作品中关于杨巍的记述虽然不多,但仅有的几首诗歌中无不对杨巍赞赏有加,且能够在相识时间并不长的情况下看透杨巍为人,更能够说明山人慧眼和杨公赤诚。二人初遇,吕时臣即赠乐府一套,且看《十二月》:

他的言,可向那青天上剖;  
他的心,可向那明月中投;  
他的身,可许那白云共宿;  
他的志,可许那黄鹤同游;  
他的寿,可与那洪崖独久;  
他的名,可与那华岳相酬。<sup>[5]附录,468</sup>

赞美杨巍说的话超尘离梦,行的事倒山移海,和气若春风霭霭,真心似明月澄澄。

山人访杨公于海上,杨公病中不能构思,有“日月逝兮”之叹。山人于杨公弟子李垞处得晋阳诸稿,更加选次。李垞云:“公有作往往弃去,故所收止此。”<sup>[8]附录,6</sup>山人在上谷谈及杨公,三军无不加额,入公门里,又闻人啧啧称贤,遂有做《手录梦山诗有感二首》:

夫子出东方,为言自汉唐。  
长空走明月,流水听沧浪。

纸贵惟书叶,官贫不食羊。  
腹中何所有,三万斛玄霜。  
辞官甘谢病,堂上有尊亲。  
结社沧州处,为渔白鸟邻。  
山林生逸气,婚嫁见清贫。  
凿凿眼前事,惟公不愧人。<sup>[8]附录,7</sup>

在吕时臣笔下,也很容易看到杨巍至纯至孝、清逸高尚、不慕名利的特点,可以作为杨巍形象的重要补充,传之后世。

## (二)诗酒情怀

酒与诗结缘,古代文人墨客都喜欢将情感倾倒进酒中,或借酒挥洒壮志豪情,或寄托离愁别绪。杨吕也极爱饮酒赋诗,但二人的酒中没有忧愁,诗中不见牢骚,而满是深情厚谊,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彼此的熟稔和关怀。杨巍诗集中留存有《和吕山人病酒》《和吕山人戏作病足病腹歌》《和吕二山人病酒作》《和吕二山人病酒口号》等作,均为答和山人所作,问候之余还不忘表达“卧病吟诗头共白,闭门三日雨声中”<sup>[6]卷7,533</sup>的浪漫情怀,其中又以《和吕山人戏作病足病腹歌》最具特色:

嗟我方病足,君何亦病腹。  
狂来还饮几斗酒,行时须仗竿竹。  
我足经旬不出门,昨宵犹梦向王屋。  
鞭捶雷霆开道路,喝叱鸾鹤同奴仆。  
君腹几日不能食,就中空阔多所畜。  
已饮仙家之玉液,更得佛氏之金粟。  
拉君共上昆仑居,餐霞驭风心何如。<sup>[6]卷4,510</sup>

开篇充满揶揄气息,仿佛老友间的玩笑,中间几句颇似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<sup>[9]146</sup>:走路尚需倚仗竿竹,兴致勃发时却可以狂饮尽兴;身体所限不得出门,梦中却仍能雷霆开路、呼鹤为仆。结尾在一人病足一人病腹的情况下还相约昆仑,可见两人内心之自由旷达。根据年谱记载,杨巍曾有两次因泥滑跌倒,两足肿痛不能动履,分别是万历十四年(1586)七十岁和万历三十年(1602)八十六岁,无论是哪一次,两人都已经历尽千帆,不再年轻。但就整体诗歌氛围来看,却丝毫不见病痛哀愁,而是轻快有趣。

从以上诗歌还可窥见,两人是诗友兼酒友,酒是杨吕交游中不可或缺的元素,饮酒的全部过程在诗歌中均有体现。喜闻朋友上门,以酒相

留,“留君且莫行,床头有黍酒”<sup>[6]卷1,483</sup>;没有五花马和千金裘,依然将出布袍换美酒,“布袍不值钱,当酒宁几壶”<sup>[6]卷1,482</sup>;没有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<sup>[7]卷23,1062</sup>,而是与雷电共饮“晴空起雷雨,把杯相叫呼”<sup>[6]卷1,482</sup>;饮酒便要尽兴,诸事且依天命,“对酒且沉酣,万事有天数”<sup>[6]卷1,481</sup>;尽兴的结果往往是病酒,可是君之挂怀却可以减轻病痛,“酒病尝难受,山人其奈何。……忽闻发高兴,予亦散微疴”<sup>[6]卷3,496</sup>。

嘉靖四十四年(1565)秋七月四日辰刻,杨公与山人重逢对酌,“有蛺蝶自北牖入口,向山人若舞,若慕,又若语,吸山人杯中,犹洒余沥于几间,从前门飞去,一低一昂,有醉客态。昔庄周梦蝶栩栩然,犹以为异,著在《南华》,传诸千载。若此蝶者直吸杯中,可谓物我一体矣。非山人抱林壑之姿、带烟霞之气不能有此。”<sup>[6]卷4,511</sup>事后山人作《醉蝶吟》,杨公作《和吕山人醉蝶吟》以记一时之胜:

小圃开樽七月初,蛺蝶飞来如相呼。

狂客当筵笑拍掌,五色翩翩下复上。

一吸杯中真有神,平头奴子却生嗔。

徘徊宛转不欲去,似恋云林最深处。

或是刘伶所化欤,不然嗜酒何同予。

万事无如一醉好,滕王庄叟两蘧蓬。<sup>[6]卷4,511</sup>

诗中的两类人形成鲜明的对比,“狂客”和“奴子”拍掌大笑、恼怒嗔怪,山人则照旧饮酒,与蛺蝶同醉,仿佛同席之人是庄周、刘伶,山人“岩岩若孤松之独立。其醉也,傀俄若玉山之将崩”<sup>[10]609</sup>,充分体现其风流的一面。

### 三、杨巍与吕时臣的怀抱共鸣

文学复古思潮是明代诗文发展的主流,从前后七子到明末复社、几社,三次文学复古浪潮持续文坛百余年,席卷大江南北,影响深入持久。然在复古思潮高涨的时候,也出现了与复古异趣的文学家,展示出新的创作风貌。杨巍与吕时臣长期游离于政坛文坛中心之外,加上性格兴趣因素,二人在创作上自出心裁、卓尔不群,在仕宦与隐逸的选择上具有明显的归隐倾向。

#### (一) 自出心裁,卓尔不群

李开先《田间四时行乐诗·吕时臣跋》云:“乙卯春,至章,得阅中麓图书花木台榭之盛,及

韵一百首诗”<sup>[11]482</sup>,证实吕时臣在去青州之前曾于嘉靖三十四年(1555)旅寓章丘,凡历三年。二人甫一见面,山人便觉李开先诗“自始至末,略无赘句,亦无常言,咸自肺腑中流去,虽初、盛唐不是过也”<sup>[11]482</sup>。李开先也对吕时臣印象极好。他讲:“吾览其诗,即知其词;览其词,即知其人。言之秀丽,必其人之清雅者也。”<sup>[11]218</sup>根据李开先《闲居集》卷三《题高秋怅离卷序》记载,在章丘时,山人与李伯华朝夕讨论,非诗则词,诗词非唐则元。吕时臣虚心向善,除了李开先,诗又请于张伯岩、陈泰峰,词又请于袁西野、高笔峰。山人转益多师,在他人的影响下诗词风格大变,个人气质也更加出众,最后的结果是“虽非唐调元声,斐斐乎有唐之中格,元之余响矣”<sup>[11]218</sup>。

后来山人游历青州,衡庄王爱其诗,为刻《甬东山人稿》,鲁王孙中立序其诗曰:“山人鹤骨癯癯,若出衣表”<sup>[12]卷147,25</sup>。陈子龙《明诗选》则“称其颇有高、岑遗调。盖万历以后,公安、竟陵交煽伪体,么弦侧调,无复正声,时诗在淫哇嘈杂之秋,尚为不坠风格,故子龙见近似者而喜也”<sup>[13]卷180,4868</sup>。吕时臣曾三度游晋,与孔天胤等三晋诗人有大量唱和之作。万历二年至五年第三次游晋时,孔天胤作《吕甬东〈闰腊迎祥〉序》,全面描述了吕时臣其人,称其有“翰藻”“游观”两奇:“文炳道德之精,笔涌江山之气。俚语珠连,妍谭玉振。翰藻既工,游观兼嗜尔”<sup>[14]452</sup>。仅谈其游观,“乃翔千仞之高,旁览德辉,测重滨之深,超登彼岸,辙迹之存,几满天下”<sup>[14]452</sup>。而在其游历过程中,王公、贤者争相延请,“光尘攸属,快睹争先。故贵公倒屣而延上座,贤人倾盖而定前言。谓其尽东南之美,极天人之际,必此人也”<sup>[14]452</sup>。

吕时臣早岁即有诗名,先于沈嘉则,后避仇远游,受到章丘名士的影响,熏染唐调元声,又在与三晋诗人交往中更重自然性情,身兼数家风格,却能在包容变化后自成一统。吕时臣是布衣山人,避祸远游,诗文除了具有怡情悦性的作用外,在明代中后期特定的社会环境里,还需作为谋生工具。然山人虽早岁为衡庄王所礼,晚年与谢榛同见知沈宣王,但诗歌中并无丝毫奉承之气,而是自然直白地道出忧愁与渴望,诗集中多有为女子代言者,与当时诗坛所倡的复古、典雅

之风大异其趣。如他怀念友人时写的“步出山阴里，霜露沾我衣。衣沾安足惜，风水阻前陂”<sup>[15]卷1,6</sup>类陶渊明；饮酒醉歌时又言“惟有刘伯伦，酒德耀寰区”<sup>[6]卷1,482</sup>，将刘伶引为知己。山人就这样带着一身卓尔不群之气，直至嘉靖四十二年(1563)遇到杨巍。

对于杨巍的诗歌，吕时臣为《存家诗稿》作序时道“实不诡于唐人，殆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”<sup>[8]附录,6</sup>；邹观光称“思沉而致远，非唐人不能道”<sup>[5]244</sup>；四库馆臣言“盖其中岁学诗，与唐高适相类，而天分超卓，自然拔俗，故能不染尘埃，独发清声”<sup>[6]提要,477</sup>。众人言杨巍诗歌有唐人之风，却绝非出于刻意模拟，而是不事雕绘，旨趣天成。对此，杨巍的观点是“诗在神不在形，在当不在多……为五七言古近体，务出神解，合于古模，得百篇可传矣”<sup>[8]附录,6</sup>。杨巍有大量盛唐风格的作品，其诗歌在情感气象和境界上也近于盛唐诗人，因为他在诗歌学习和创作生涯中实以唐人为典范。前后七子着力复古，喊出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的口号，如此看来，杨巍的“宗唐”似乎并不独特，但实则不然。前、后七子在复古运动中充分学习盛唐诗并有所成就，但他们也拙劣描摹，造成随波逐流、仿效太甚的积弊。杨巍与王世贞同年，与李攀龙、谢榛同乡，但与复古巨子们交游不多，诗风亦不受影响。同时，因为他人品清超谦和，胸中无既定理念之芥蒂，诗歌风韵反能出于谢榛、李攀龙之上。所以杨巍虽同样宗唐，却不为后七子所囿。他并不固守一体，也不停留于格调的模仿，更不精雕细琢，而是耕耘已壤，创作发自本心，发挥个性，学唐诗之真谛，仿盛唐之气韵。

王士禛对梦山诗尤多激赏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论曰：“盖其神韵清隽，与士禛论诗宗旨相近，故尤赏之。然其他高旷简古之作尚复不少，固与当时嘈杂之音相去远矣。”<sup>[6]提要,477-478</sup>王士禛将杨巍归入王维、韦应物、高叔嗣一系，言其与徐祯卿诸人同属明诗之古澹派，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杨巍诗歌的特点，但纵观杨巍诗集，这类诗只是他诗作中的一部分，他的生活经历远比徐祯卿、高叔嗣复杂，诗中反映的现实生活也更为广阔，对现实的关怀也更深刻。杨巍的五古《苦寒行沁州山中作》《示祈雨官吏》、五律《王义镇用麦饭》《石州陷后作四首》、七律《平定元宵无月》《酬刘二府过

岭园》等，都表现出对于民生疾苦关怀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他的诗又继承了陈子昂、高适、杜甫等人的风格。

杨巍爱好交游诗友，其中与曹忬和吕时臣关系亲厚，交游甚笃。杨巍自称中年开始学诗，受到曹忬和吕时臣的指导。“余幼习举子业，不知为诗，至嘉靖乙卯外补晋臬时，督学使者为曹君纪山，始提携余为诗，谓以唐人为宗，且辨其体格，余不甚解。及余归田，有四明吕山人者往来海上，相与倡和，共明此道，听其所谈，亦不甚解。”<sup>[6]跋,541</sup>陈田亦云：“梦山自书《存稿》后，乃谓得于曹纪山、吕时臣为多。雅抱冲襟，令人翛然意远。”<sup>[16]戊签卷4,1444</sup>曹忬、吕时臣包括为杨巍《存家诗稿》作序的邹观光都是“宗唐”人士，在他们的影响下杨巍逐渐具备了体格意识。嘉靖三十六年(1557)，杨巍选辑《弘正诗抄》，收录李梦阳、何景明等人的优秀诗作，十位诗人都是推崇唐诗、实践复古者，表现出杨巍诗歌方面的宗唐理念。曹忬为此书作序称：“二山杨君盖工于诗者，与余论作者极致，大都先格调、次声响，体裁不高、声响未及，终归下乘。”<sup>[17]序,2</sup>由此可见，杨巍对唐诗有自己的认知与审美，其“宗唐”热烈而不失理性，追求却不陷盲从。

吕时臣侵染魏晋唐元，游历东西，完全处于复古潮流之外，风格包容变化，自成一体；杨巍受到吕时臣的影响，宗唐却别出心裁，兼有王维、高适风格，两人同样卓尔不群，给处于沉重复古潮流下的明代诗坛吹进一股清爽之风。

## (二)山林之思，隐逸之志

杨吕自初遇时就设想过隐逸生活，并穷尽后半生为之努力。山人每向杨公言，欲建一空楼，杨公作诗嘲其难成。杨巍亦欲构建绣岭别业，后果成，山人乃赠作阳春之词，击节而歌，令人有尘外之想，词中道不尽绣岭十景之胜，却处处透露出二人的山林之志，如“恁待要万里封侯，试看那鸟倦还归云岫”<sup>[5]附录,468</sup>“老圃浇蔬得自由，平生淡薄能消受”<sup>[5]附录,469</sup>。后杨巍沉浮官场，屡次请辞，梦想“从此相将愚谷隐，浮名浮利不关予”<sup>[5]卷5,517</sup>；吕时臣则游吴会，过白下，出淮泗，登泰山，谒关里，至青州，交游诸人，矢志不移。

吕时臣一生不仕，游历齐、梁、燕、赵间，客食诸王门下，用生命践行着他的山人身份。而杨巍

官至太宰,德高望重,在入仕还是归隐的选择上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——半官半隐,他与王维相似又不相同。杨巍在《存家诗稿跋》中自云:“余疏散人也,况习禅寂,不好苦思”<sup>[6]跋,541</sup>;王维则是“退朝之后,焚香独坐,以禅诵为事”<sup>[18]卷140,4</sup>，“晚年唯好静,万事不关心”。<sup>[19]卷5,476</sup>两人“隐”的选择和诗风的禅悦澄明都受到佛教的影响,然王维的隐退是因为政局变化无常而逐渐消沉,其中带有对官场的不满。杨巍则不然,他官在万历新政的中兴时代,与张居正同科,又颇得皇帝赏识,他的“隐”多半是自身性格兴趣使然,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母亲和自己年高不济。

杨巍幼时就表现出对于田园的喜爱,八岁可以植树艺花,十一岁跟随父兄学习耕耘,读书和园艺几乎占据了整个童年。杨巍自嘉靖二十六年(1547)登进士第,直至万历十八年(1590)致仕,为官近四十年,守中庸之道,克己奉公,不攀权附势亦不落井下石,真如吕时臣之评:“凿凿眼前事,惟公不愧人”<sup>[8]附录,6</sup>。王大辰案发时,张居正当国,欲以此事牵系高拱,杨巍病中斡旋,救得高拱,因见江陵喜好竞进之人而不用恬静之士,遂告官回乡。后张居正倒台,宵小之徒欲报复更兼取高位,上书抄江陵家,杨巍与部院大臣上疏救之,被攻诘有失晚节,幸得皇帝信任,“卿秉铨公正,时望攸归,着遵旨供职,不准辞”<sup>[5]22</sup>。杨巍忧心纷扰的国事却不关注朝廷斗争,与布衣交往却不与权贵同列,自始至终他都怀揣着“已识乾坤大,犹怜草木青”<sup>[20]808</sup>的慈悲和“但求干戈戢,勋名非所志”<sup>[6]卷1,481,482</sup>的愿望,甚至一朝得志可以即刻辞官“宝篆肯相授,明朝即弃官”<sup>[6]卷2,489</sup>。

吕时臣是布衣山人,杨巍是宰辅之臣,两人看似殊途实则同归。难得的是,两人的隐逸选择都不是时局所迫,也没有经历从入仕到归隐的艰难转变,而是在有更优渥选择的情况下,在相识之前,两人不约而同地出于真心“卖剑买琴”。

吕时臣在诗集中多次以贫士、贫女自况。他表述自己的志向:“爱读古人书,析理极欢怍。纵令万黄金,焉能夺吾贱。”<sup>[15]卷1,4</sup>山人如此立言也如此实践,吕时臣客居辽王府时,辽王欲署山人一个官职,命记室杨伯仁再致意,山人遂写《上辽王》谨辞:“受知古来难,感激托方寸。完予布衣

名,其余非所愿”<sup>[15]卷1,7</sup>。在吕时臣看来,布衣之身远比功名贵重,而世外桃源一旦沾染俗尘也将败兴:

### 山中吟·其二

桃园渺何许,武陵万仞山。  
缅想秦时人,生死桃花间。  
尔来几天地,曾无几人闲。  
桃树催为薪,桃源平作田。  
鸡犬入租税,焉可住神仙。<sup>[15]卷1,1</sup>

吕时臣自是神仙中人,而在杨巍的描述中,山人更添一分风流不羁:“振藻江湖里,声名到处闻。惟知崇隐节,不肯慕奇勋。面带烟霞色,身将鸾鹤群。风流郭有道,诗韵沈休文”<sup>[6]卷8,539</sup>。山人有《贫女欢呈杨曹二中丞相》,杨公作《贫女行和吕山人》再次称述“高门自富吾自贫,肯以罗绪改贞德”<sup>[6]卷4,523</sup>。不慕富贵、坚守贞德的是贫女,亦是这对身份悬殊的至交好友。

在人生苦短与生命体验上,两人也具有共识,均认为浮生若寄,时间飞逝,杨巍言“流年何超忽,世事笑空虚”<sup>[6]卷1,483</sup>,吕时臣亦歌“人命亦可畏,流光迅火烁”<sup>[15]卷1,4</sup>。面对“去日不能再,来日宁几多”<sup>[6]卷1,481</sup>的人生,两人时有悲观情绪,山人认为世间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,“天地岂长生,日月尚枯槁”<sup>[15]卷1,1</sup>;杨公仅到知天命之年就常叹“百龄今已半,日月谅无多”<sup>[6]卷1,483</sup>。既然岁月短促,就更不应该被愁绪左右,所以悲观只是暂时,及时行动、不负明时才是长久的方向。

不过应该提出的是,杨吕在不虚此生、及时行动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,但在具体实践时存在差异,这也与二人的身份有关。山人无官一身轻,着重在及时行乐,追求长生,“六代豪华问土丘,人生行乐须时候”<sup>[5]附录,468</sup>;杨公半官半隐,则更倾向于克尽厥职,以期早日回归自然,“早立功勋报明主,与尔骑鹿昆仑去”<sup>[6]卷4,513</sup>。他们生逢盛世,嘉靖、万历皇帝均少年天子,有所图治,文人士子具有“早晚侍枫宸”<sup>[6]卷2,494</sup>的时机。同时,复古浪潮席卷文坛,公安竟陵角奇斗艳,戏曲、小说等新文学形式也迅速蔓延,不同文学流派和主张并起,营造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,所以,杨巍和吕时臣的理想都得以实现。

最后,以杨巍一诗为两人的清风高谊作结。彼时绣岭别业初成,杨吕相交尚浅,山人脱稿《绣

岭新词》呈杨公改教,杨公览毕,恍然叹曰:“三径就荒,久切山林之志;一丝无补,空惭明圣之朝。早遂归心,休妨贤路。与尔吕山人种瓜于小圃,放棹于东溟,吟几首龙褒趁韵之诗,酌几杯陶令无钱之酒。乐太平之世,全衰朽之年,足矣,足矣!遂信笔作一诗,以竟山人之妙词,以为他日之左券云。”<sup>[5]附录,469</sup>诗曰:

独作移文劝我归,高情如此世应稀。  
曲中山水凭谁听,梦里烟霞傍客飞。  
多病只愁车马路,衰年偏爱薜萝衣。  
何时杖履来相访,共尔沧江坐钓矶。<sup>[5]附录,469</sup>

嘉靖后期至万历前中期,复古思潮逐渐式微却仍有深刻影响,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学思潮兴起然尚未占据主流,与此同时,心学渐入空谈,俗文学兴盛起来。值此文学思想的转变时期,杨巍与吕时臣长期游离于政坛、文坛中心之外,也不与复古诸子交游酬唱,而是以恬淡旷达的性格不慕名利,追求隐逸;以清隽自然的文笔宗唐却别出新意。两人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的友谊在世俗谄媚、身份悬殊的情形下格外难得,卓尔不群的创作风格也如和隋之珍,让文坛熠熠生辉。

### 参考文献:

- [1]张廷玉.明史:19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2]王世禛.带经堂诗话:上[M].张宗柞,编.戴鸿森,校点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3.
- [3]鄞县志[M]刻本.1877(清光绪三年).
- [4]朱彝尊.静志居诗话:下[M].郭绍虞,编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.
- [5]政协无棣县委员会.明太宰杨巍史料集[M].北京:中国文化出版社,2010.
- [6]杨巍.存家诗稿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- [7]李白.李太白全集[M].王琦,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99.
- [8]杨巍.梦山存家诗稿[M].刻本.1602(明万历三十年).
- [9]邹同庆,王宗堂.苏轼词编年校注:中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2.
- [10]余嘉锡.世说新语笺疏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11]李开先.李开先全集:上[M].卜键,笺校.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4.
- [12]山西通志[M]刻本.1734(清雍正十二年).
- [13]纪昀.四库全书总目提要[M].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0.
- [14]张勇耀,韩兵强.孔天胤传[M].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2017.
- [15]吕时臣.甬东山人稿[M].刻本.1581(明万历九年).
- [16]陈田.明诗纪事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.
- [17]杨巍.弘正诗抄[M]刻本.1557(明嘉靖三十六年).
- [18]刘昫.旧唐书:15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19]王维.王维集校注[M].陈铁民,校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97.
- [20]马一浮.马一浮集:3[M].马镜泉,等,校点.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6.

(责任编辑:周新颜)